

从研中海
书究国
外

刘东主编

China Turning Inward

中国转向内在

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刘子健 著

赵冬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从研中海
书究国外

1200239286

刘 东 主编

China Turning Inward

中国转向内在

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刘子健 著 赵冬梅 译 柳立言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opyright © by James T. C. Liu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2
(海外中国研究/刘东主编)

ISBN 7—214—03108—6

I.中... II.①刘...②赵... III.文化史—研究—中国—宋代 IV.K24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833 号

- 书 名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著 者 刘子健
责任编辑 王保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页 5
印 数 1—4 125 册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08—6/K·458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 150 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 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序 言

11 到 12 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个案。

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即宋代中国（960—1279），描述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得多。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



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viii 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背景。

不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

假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向？这便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对许多人和事，我都怀着无比的感激。对我的妻子刘王惠箴博士，我要感谢她从未间断的宽容和谅解；对中国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已故的洪业教授（William Hung），我要感谢他在学术上的多方垂范；对我的母校匹兹堡大学已故的 Leland D. Baldwin 教授和 George B. Fowler 教授，我要感谢他们时

常提醒我要立论持平；对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杨联陞先生，我要感谢他的博学多闻，在我做客坎特伯雷的数年中，他曾慷慨地给予我建议；对已故的 Anatole Mazour 教授和 Albert E. Dien 教授，ix 我要感谢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时给予我的鼓励；对杜维明教授，我要感谢他源源不断的激励，在他前往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重返哈佛之前，我们曾在普林斯顿共同设计课程和从事编辑工作；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的 Willard J. Peterson 教授，他参与我的讨论课程，对我的研究一直保持兴趣。

我从与多位海外学者的不断交流中获益良多。在台北，有宋晞和王德毅教授；在北京，有邓广铭、王曾瑜、陈智超以及其他多位教授；在东京，有已故的青山定雄教授和我特别要提到的斯波义信教授；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京都的宫崎市定、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衣川强诸教授。当然，本书的错误一概由我个人负责。

最后，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出版部的 Katherine Keenum 博士，她以最大的耐心编辑本书，促其面世。我在普林斯顿东亚研究系的同事 James Geiss 博士也曾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建议。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从北宋到南宋

一、关注差异	4
线索与方法	8
资料与假设	13
二、宋代学术	18
文学	19
经学	24
史学	27
三、宋代儒学	33
思想与制度	33
不同派别的新传统思想	38

第二部分 12世纪

四、道德保守主义	47
亡国之耻的震撼	47
变革之门的关闭	55
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	60
五、专制政体与宰相们	72
走马灯般的宰相(1127—1134)	77
宰相团队(1135—1136 及以后)	82
权相长期独掌朝纲(1139—1156)	88

别有用场的前宰相(1161—1162)	91
六、个案研究:从辉煌到流放	96
谁有资格做榜样?	97
初擢签书枢密院事	98
宰相团队和国家政策	102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政治风格	106
从巅峰到低谷	113
第三部分 新儒家成为正统:得不偿失的胜利	
七、道德挂帅的新儒家:从争论、异端到正统	120
分析架构	121
道德先验论者自命正统	124
思想的传播与道德的结合	126
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	129
失算的“伪学”之禁	132
从危机到国家正统	135
余论	140
注释中所用简称	145
注释	146
参考书目	171

导 言

南宋王朝(1127—1276)在错综纷乱的战火和灾难中诞生,然而,它最初几十年的政治、文化发展趋势却将塑造此后中国的形象,其影响绵延若干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遭遇的为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打击,正部分契合了中国历史的大轮廓。知过往所以鉴未来,为了了解12世纪的特殊品格,有必要对此前的历史作一番简短回顾。

作为此期历史的较远背景,唐代是必须加以关注的。从7世纪到9世纪,唐帝国是人类文明的巅峰,它世界性的文化光芒从太平洋之滨一直投射到中亚细亚。唐和波斯、印度保持着松散的往来,对遥远而落后的欧洲则完全未知。10世纪初,地方性的军事篡权者纷纷建立独立王国,唐王朝陷入军阀割据的灾难之中。内乱之外,又添外患,富于侵略性的北方游牧集团越过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城一线,侵入中国北部。对于生活在平原上、以农耕为业的中原汉人来说,他们是外来的征服者,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吸收了唐文化的多元因素,并与其本民族文化相融合。

汉化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悠久



的传统,长期战乱、异族入侵都未能阻挡它顽强的发展。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经济增长依然活跃。一旦宋朝(960—1276)建立,和平重现,汉文化又将以更新、更强的生命力开花结果。

宋王朝统一了唐帝国的大部分农耕地区,但不是唐帝国的全部疆域。它采取亚洲定居国家遭受马背民族威胁时的通常对策,向北方好斗的邻居——契丹帝国缴纳岁币,来购买和平。一个半世纪以后,新的游牧民族出身的征服者——女真崛起。女真先是与宋结盟共灭契丹;而后继续推进,试图吞并整个黄河流域。那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被汉人充满深情地称为“中原”的地域。女真建国号为“金”,宣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并索取比契丹高得多的岁币。宋朝百般努力,均未能收复北方领土,只好在中国的中、南部重建王朝,后世称之为“南宋”,其领土仅相当于原来的2/3。

到13世纪,又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的出现,宣告了南北分立局面的终结。这个世界征服者,像旋风一样席卷了从黄海到维也纳之门的整个欧亚大陆。在中国,蒙古人的朝代被称为“元”(1279—1368)。像那些取代唐朝的游牧民族一样,他们逐渐接受了汉人的方式。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激发了欧洲的扩张,世界历史进程正在发生转向;而中国人却继续以其独特的方式延伸着其独有的文化。直到20世纪,宋代汉人生活中最富特色的东西仍然清晰可辨。

国家被异族所征服,而汉文化延续不衰,二者相互平衡,构成中国历史的模式之一。汉文化绵延不绝,但绝非静止不变。这是历史的大轮廓,它传递着某种真实。然而,要想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全景,就必须靠得更近一些,仔细观察那些构成历史发展轮廓的细小片断。每个王朝既有相似之处,更有独特之处。具体到宋朝,至关重要的是观察南宋之所以区别于北宋(960—1126)而

构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因素；它将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当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有鉴于此，本书开宗明义，把研究焦点置于12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

3

第一部分 从北宋到南宋

一、关注差异

7

现代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按照中国史料传统，以朝代划分中国历史。然而，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①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正是本书的研究主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

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

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②

举例而言，在政府方面，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官僚行政体制。^③皇帝之下，是庞大的集权制行政机构，其成员为士大夫，8 其中的大多数通过公平的书面考试入仕，通过资历、德行评定和荐举循资迁转。他们遵循特定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处理行政事务。这些官僚并非拥有封建领地的世袭贵族，因而需要在城市里置办永久性居所。在宋代中国，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城市有两打之多。当威尼斯和巴黎还只有 10 万居民时^④，北宋首都开封就已经拥有 100 万人口，而南宋首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则达到 150 万。更重要的是，开封、临安以及其他大城市是活跃而开放的^⑤，商业、手工业和娱乐业欣欣向荣，儒、释、道三教的活动和节日并存，纸币在流通^⑥，印刷术（尽管还不是活字印刷）使书籍变得容易获得和相对便宜。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官员、商人、香客和流浪艺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旅行，将市民文化传播到乡村，返乡过节的工人则把最新的流行带回家乡。尽管只有少数商品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多环节的供应渠道却已经使得大米、茶、丝等商品形成了地区间和地区性的贸易市场。

与市民生活同等重要的是农村生活，宋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产、技术最发达的农业。^⑦早熟水稻良种的推广使得同一地块上的一年两熟制成为可能，而与此同时，欧洲却仍然盛行着落后的二田制或三田制，每年都有一半或 1/3 的可耕地处于抛荒状态。灌溉用水车以及水动的给水、排水、脱粒、碾磨机械的发明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加之大约人均两英亩的可耕地，所有这些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业国。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瓷器等优质



商品的制造方面，许多工序是在拥有 500 名雇工的工厂里完成的，这些工人按照一定的劳动分工工作。⁸

- 9 所有这些关于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起来的确相当“摩登”，因此，此期有时又被贴上中国近代初期的标签。⁹然而，这种观点却不无漏洞：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近代化的外表之下，却自相矛盾地生长出顽固的传统。那些可以被描述为近代特征的东西，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它们继续发展，但不是扩展成为新的思想和技术，而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举例言之，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抬头和经济的不断扩展，士大夫们却仍然瞧不起商业和制造业，而更愿意追求经典教育和仕途。首先是政府作为团体，其次是官僚作为个人，构成了商品的最基本消费者，而两者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11 世纪中叶王安石变法之后，他们甚至对政府计划经济也兴趣全无。相反，当时势艰难时，他们强调节俭，重申儒家对于父系家族集团的重视，以此来促进人际互助。¹⁰族规家范重新强调祖先崇拜的礼仪和儒家关于家庭的实际责任，其理由正和数百年前这些观念被首度表述出来时相仿佛，那时处于贵族社会中的人们渴望通过建立人际纽带寻求安全感。¹¹从以上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宋代中国特别是南宋，是顾后的，是内向的。许多原本趋向洪阔的外向的进步，却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内向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这中间必有缘故。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奇特的转变？

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¹²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

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宋代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因为它重新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旧的基础之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会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经历修正、更新、丰富、完善的有机体。¹⁰

打个比方，宋代中国就像是一棵茂盛的老树，它爆发出令人称奇的生命力，长得比从前更高更大，新枝嫩叶覆盖着树身，树干下古老的根须在伸展。而后，一个风暴的季节损耗了它机体内部的活力。残存的生命力转变成自我保护的功能。老树尽可能顽强地继续生长，而它的大小和形状却保持不变。那么，什么是它机体内部的致命变化？

仔细考察两宋之际的中国，给历史学家们留下印象更为深刻的往往是 11 世纪即北宋中期的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而不是这些进步在 12 世纪即南宋所发生的转变。然而，更深入的研究却将使我们的观察更为敏锐。事实上，就在 12 世纪持续发展的表象之下，质变已经出现。

抓住两个世纪之间质的区别的最便捷的办法，是强调彼此间的显著差异。这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差异并非全部事实。它们只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观察所得的镜像，正如我们在特殊光线下透过放大镜所看到的那样。

11 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勃。与之相比，在 12 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